

屈原

陸侃如編

屈原評傳

(前三四三—二九〇?)

陸侃如

(一) 任職與去職

惟黨人之偷樂兮，

路幽昧以險隘。

豈余身之憚殃兮？

恐皇輿之敗績。

忽奔走以先後兮，

及前王之踵武。

蓀不揆余之中情兮，

反信讒而齎怒。

——離騷。

春秋時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，（在今安徽淮河流域）。他的子孫就以地名做氏。四百年後，（西歷紀元前七四〇至三四〇），有一個屈原，爲中國最早的大詩人。史記屈賈傳及新序節士篇裏說他名平，字原。卜居漁父又稱他爲屈原，却没有提及平字。這已是可疑了。他又在離騷裏自叙道：

『皇鑒揆余于初度兮，』

肇錫余以嘉名：

名余曰正則兮，

字余曰靈均。」

楚辭集注引高平說：「原故名平而字原也。正則，靈均，各釋其義以爲美稱耳。」這說似近牽強。試問屈原在此處爲何不把名字正式說出呢？蔣驥山帶閣註楚辭引某人說：「古人有小名，有小字。……蓋屈原名平，而正則，靈均，則其小名小字也。」按小名至今尙存。但屈原時有無此風，則不可知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，如司馬相如名犬子，謝靈運名客兒，庾信名蘭成，都在屈原之後；即陸龜蒙的小名錄，也是從秦代起的。而且小名外還有什麼小字，則更不知其所本。故這說怕也靠不住。對於這樣一位大詩人，竟連名字也弄不清楚，這是我們愛文學者同引爲憾事的。」

他在離騷裏又說：

「攝提貞于孟陬兮，」

惟庚寅吾以降。」

爾雅說：「太歲在寅曰攝提格。」朱熹因此處省去格字，便說不是指年。但這個字的省與不省，大約是沒有關係的。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，張純奏說：『今攝提之歲……』這年恰是甲寅年，而格字也省去。由此可知屈原的確生于寅年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末年（周敬王四十三年，西歷前四七七年）是甲子年；自此推算下來，則西歷前三五五年是丙寅，前三四三年是戊寅，前三三一年是庚寅。依史記，楚懷王十六年（西歷前三一三年）絕齊時，屈原已被讒去職了；若他生于前三三一年，則此時年僅十九歲；故這個生年決不能成立。又依我仔細研究的結果，知道他死于頃襄王九年（西歷前

二九〇年）左右；若他生于前三五五年，則他投水時年已近七十歲了：可見這個生年也不妥當。若我們定前三四三年爲他的生年，則楚絕齊時爲三十一歲，死時爲五十四歲，便很近情理了。（這年是周顯王二十六年，楚宣王二十七年。）

屈原生的地方，我們並不知道。水經注說：『秭歸縣……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，累石爲屋基。』（秭歸在今湖北西部。）但杜甫在夔州時所做的最能行末段說：

『若道上無英俊才，

何得山有屈原宅？』

這又與水經注不同。林雲銘說：『少陵當日雖在夔州，而屈原宅却在荊州府之歸州；以歸州當春秋時亦夔子國故地，因舉全夔而總言

之。非謂夔州府有屈原宅也。『這說恐怕是錯的；因為杜甫不過述他舟行夔峽時的雜感，那裏遠想及春秋時夔子的國界呢？而且杜詩與水經注都是不能作考證的根據的，我們正不必勉強去調和這兩說。而且即使知道了屈原宅確在何處，也不能說這就是他生的地方。故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只好闕疑了。

他家庭裏的人，我們知道的很少。離騷述他的父親叫伯庸，不

知是名是字。這篇還提及「女嬃」。說文引賈侍中說，楚人呼姊爲

嬃，王逸也說這是屈原的姊姊。清人梁章鉅的文選旁證引張雲璈引

楚辭集解云：「嬃者賤妾之稱，比黨人也。嬋媛，妖態也。」旁

證又引朱綬說：「以下文「衆不可戶說」觀之，則女嬃自宜以黨人

解之。若內被姊詈，不得歸之於衆也。」我未見楚辭集解，故不知

這種注解的根據，但我可斷定他有些誤會。文選的西京賦『增嬋娟以此多』句的薛註說：『嬋娟此多，姿態妖疊也。』集解之訓『嬋媛』爲『妖態』大約是由此而誤會的。但『嬋娟』與『嬋媛』不同——古人大都訓『嬋媛』爲『牽引』或『連引』——故不能相混。朱氏的話也不對。『衆不可戶說』不是屈原的話而是女嬃的話，『衆』卽指當時的黨人。故我以爲還是賈王二氏之說是更近理些。

除了父與姊以外，其餘便無從查考了。他二十歲前的生活，我們也不知道。但他是楚國的貴族，他的生活總是一種很安適的富有詩意的貴族生活。從他的作品中看出，他在這時總學得了許多古代掌故及種種神話——司馬遷也說他『博聞強志』。

二十歲以後，便是他投身政界的時候了。史記說他做左徒。左

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，只次于令尹。我想屈原雖貴族，恐未必能憑空做到。他任左徒之前，當然是先任了幾時較低的官職了。但這種官吏生涯的開始也不至太遲，（因為他是貴族），我們定在他二十一二歲就是了。他任左徒的時代，史記裏沒有說，但我們可從新序裏得到一些暗示。節士篇說：

『秦欲吞滅諸侯，并兼天下。屈原爲楚東使于齊，以結強黨。秦國患之，使張儀之楚，貨楚貴臣……』

張儀至楚是懷王十六年的事。十六年以前，齊楚親善的唯一的事蹟便是十一年的縱約。屈原能與這回縱約有關係，可見他這時已在左徒之位了。由此可知他任左徒必在懷王十年左右。

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時代。懷王是一個中庸之主：他自己沒有

才識，不能積極的有所貢獻于國家；但也不至十分爲惡，所以也能消極的讓屈原去整理國務。屈原具有辦事的能力與熱誠，『明于治亂，嫻于辭令』。遇到這個機會，他的愛國心正好如願以償：『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』。這時他總有許多關於政治上的文字，却都沒有傳下來。依我看來，九章中有一篇橘頌大概是這時的作品。

前人對於這篇的時代有兩種說法：

(一)在頃襄王放逐他到江南後。這是王逸的主張。他以爲九章都是『屈原放于江南之野』時的作品；橘頌是九章之一，故也在此時。贊成此說者很多。

(二)在懷王朝被讒後。清人姚鼐說：『鼐疑此篇尙在懷王

朝初被讒時所存，故首言「后皇」，末言「年歲雖少」，與涉江「年既老」之時異矣。而「閉心自慎」之語，又若以辨釋上官所云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」之爲誣也。」（見古文辭類纂，卷六十一。）

王氏以爲九章九篇是一個時期內的作品，其謬誤現在知道的人很多了；但對於橘頌仍不敢有異議者，因爲『文辭渾然，莫可究詰』（蔣驥語）。但我們如今却可不必管他了。姚說以內容作根據，好像很可信，但也不免流于附會。屈原不過以爲橘樹『受命不遷』，『深固難徙』，以爲他『行比伯夷』，『可師長』，故作這篇來贊他。全文中並無一些被讒去職的暗示；所謂『閉心自慎』，也是指橘樹而言；若是指自己，則下文的『可師長』一語便講不通。這篇與頃襄

王時的放逐固然是無關，但與懷王時的讒言又有什麼干係呢？

我把他定爲這時的作品理由是：（一）屈原所以要作詩，不過要寫出他胸中的怨憤，故他的作品裏大都充滿着牢騷話；因爲他是一個性急而量窄的人，故談不到什麼「涵養」。這橘頌裏既無牢騷話，便可證明不作于失意後了。（二）後人對於屈原的作品，崇拜的無可無不可；昭明太子在文選裏削了幾首，便受謗至今。屈原在中國文學史上特殊的位置，我們是不用懷疑的；但依我個人的觀察，他的作品中也有些不很高明。別的且不談，只就橘頌而論，我覺得有兩種很重要的缺點，使我們無從贊美。這一點也可證明這篇是他壯年的未成熟的作品。

那兩種重要的缺點是什麼呢？第一是詩思的窘狹。屈原的詩思

本來是很豐富的，而在這篇裏却特別的窘狹。試看他已經說了『受命不遷』，下文還說『獨立不遷』，還說『蘇世獨立』；已經說了『深固難徙，更一志兮』，還說『深固難徙，廓其無求兮』。說來說去，並沒有添出新的意思來。可不令人失望嗎？我們的意思並不是不許詩人用重複的語句與廻環的詠歎。打開詩經一看，便知道三百篇中大都是有些重複的。我們隨便舉一個例罷：

漢廣（周南之九）

(1)

南有喬木，

不可休息。

漢有游女，

不可求思。

漢之廣矣，

不可泳思。

江之漾矣，

不可方思。

(2)

翹翹錯薪，

言刈其楚。

之子于歸，

言秣其馬。

漢之廣矣，等等。

(3)

翹翹錯薪，

言刈其蕀。

之子于歸，

言秣其駒。

漢之廣矣，等等。（依韓詩。）

我們讀了，不但不覺其可厭，反覺餘韻悠然不盡。我們須知：重複的語句與迴環的詠歎不但不是藝術上的缺點，實在是詩人表情手段之一。但在橘頌裏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——因為這篇本來沒有什麼濃厚的情緒可表——故我們不能說這些重複是著者故意用來表情的。

第二個缺點是抽象話太多。我們讀了這篇，並不覺得有什麼動人之處，並不能受到什麼深刻的印象，便是爲了這一點。例如：

「閉心自慎，

終不失過兮；

秉德無私，

參天地兮。』

這幾句竟可以入宋代道學先生們的詩集裏去了！屈原本想用具體的橘樹象徵抽象的高尚人格，故處處把橘樹當作人類看待，與西洋古典派詩人用『人格化』(Personification)的方法一樣。但文學手腕不純熟，故不能使我們得到什麼明瞭的觀念。我們試拿離騷來比較一下，便覺相差甚遠。

『吾令鳳鳥飛騰兮，』

繼之以日夜；

飄風屯其相離兮，

率雲霓而來御。』

『吾令鳩爲媒兮，』

鳩告余以不好；

雄鳩之鳴逝兮，

余猶惡其佻巧。』

這裏也是把鳳鳥、飄風，雲霓，鳩，鳩等物當作人類看待，但因爲沒有抽象話，故二千餘年後的讀者還可想像那來御的飄風或鳴逝的雄鳩。但我們讀了橘頌，却不能想像橘樹怎樣的『可任道』，怎樣